

## 李迺扬<sup>①</sup>

地点：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

时间：1993年8月6日



钟：很高兴在日本见到您。听说您当年在东北跟尚钺<sup>②</sup>老师学习过？

李：我见尚钺老师时才十七八岁，那时还没有满洲事变呢。我们的学校是毓文中学，私立的，号称小南开，校长李光汉是南开大学肄业的，他学习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，很出名。老师多是从北大来教课的，专讲新文化运动，尽是新派。周××老师是教图画的，老共产党员，但很平稳。后来突然来了一位杨定一老师，一位尚钺老师，受到学生的欢迎。尚老师正好教我们

①李迺扬，1912年生，吉林人。1932—1937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留学毕业，回国任教。在日本主办东海书局，中文出版社。

②尚钺(1902—1982)，中国历史学家。河南罗山人。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195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系主任。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。

班的国文，高丽同学金日成<sup>①</sup> 在我的下一班。

尚老师没带着属，一人住在校内，在一间小房子里，自己做饭菜。杨老师有家在校外。我同尚老师关系好，我那时就常写各种小说，他在课堂上布置写文章，我是文不对题地写小说，交上去，他就给改。抄了再改，改了再抄，往返三四遍，他也从不挑剔。结果课堂上的作业我全是写小说了，等我写完改完，就拿去报社投稿，报上就有发表的了，不过不给稿费，报纸也全是日本人办的。后来我同萧军<sup>②</sup>、萧红<sup>③</sup> 建立联系，就是都在东北投稿的缘故。

我当时就感到尚老师不一般，他是长脸，个儿不高，有口才。他有时找几个同学，有我一个，金日成一个，下课去他宿舍里聊天，他宣传共产党的思想。他拿手比着，一手高一手低，他说：“你瞧，国民党就渐渐低下去，共产党就升起来，渐渐就平了。”同学们就问他，什么叫共产党？什么叫国民党、三民主义？我们都不大明白。我对于共产党倒是明白的，因为我看俄国小说比较多，不是看屠格涅夫那些，而是俄国革命时期作品，我看得很多。尚先生就发现我了，他灌输给我许多革命思想，但不拉我进党。你自己愿意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他就让你如何发展，这样彼此关系不隔阂。相处久了，有一天，他就给我一个东西，是孙中山先生的像章，有铜纽扣大小，上面有孙先生的头像和党旗，那是国民党左派的东西。他是单独送给我的，我也就明

---

① 金日成（1912—1994），朝鲜劳动党主席。

② 萧军，1907年生，辽宁义县人，中国作家。其主要作品有：《八月的乡村》（1935年）、《过去的年代》（1936—1955年）、《五月的矿山》（1948年）等。

③ 萧红（1911—1942），原名张迺莹，黑龙江呼兰河县人。1936年7月因病赴日本疗养，1937年初回国，1942年病逝于香港。其主要作品有：《生死场》（1935年）、《牛车上》（1937年）、《呼兰河传》（1942年）等。

白，当时是不能戴上街的。不过我没有加入共产党。

尚老师穿衣服很朴素，吃东西也简单，自己动手用小锅做一做就得。他那时一个月有90元钱吧。金日成那时已经参加党的活动，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我是三年级学生，金在二年级，他的活动特别多，等上面来人要抓他时，他就没影了，不知去哪儿了。我们当时叫他金胖子，他当时叫金成柱，爱踢足球，那时的足球是个猪吹脖，用嘴吹足气，再绑上，可以光脚来踢。叫做“熊头”，据说是秦桧的脑袋。后来我去日本，他回到朝鲜。我是在报纸上才看到他的消息的。

后来我们学校被日本侵略者关闭了，要抓思想犯。朝鲜学生在校内散发传单，就被抓了20多人吧。尚先生也就走了，教职员和学生，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。他们共产党之间有不同意见，还有人写黑信告他。后来校长也被捕死在狱中，我也就离开学校。到了天津，我参加过学生卧轨行动，卧了两天，我是学生的副会长，因为拉肚子，没有能去南京见蒋介石先生。救济局发我们每人10几块大洋，叫我们回家。我拿了钱，没有回家，看见梁启超先生的文章，讲他在日本学习半年，就可以翻译日文了。我想，我去学一年，也该会日文了。那时去日本也不用护照，我就以东北流亡学生身份上日本了。我直接就从天津上船，一直到神户上岸。

我进了预备学校，考到官费，必须有学籍。我花5块钱报考早稻田大学，没有考上。我一气之下，就到广岛来了。广岛的大学有特设预科，一共有20多人，一年后升班，一共念了6年才毕业。我那时还是写文章，投稿到天津大公报的“小公园”副刊。发表后寄来稿费，我得到火车站附近的邮局去领取，我去领钱还没有装进口袋里，就被后面的日本特务跟上了，把我抓去审问，还把我的住地翻了个乱七八糟，说我是共产党。后

来是学校方面保证说，没有发现这个学生有什么不轨行为，这样才放了我，还限制我说：“不准往大陆投稿！因为满州国成立了。”

钟：喔，这么个理由？

李：我在东北时，就写过长篇小说，在《泰东日报》副刊连载，这样一来我也只好放弃了，所以特别恨日本。我上学时就多半逃学，经常钻在图书馆里，查阅日本有什么特殊问题。以后教授找我去谈话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拿到我在图书馆里用的借书证，一看上面全是关于朝鲜的书籍，他就说：“你怎么对朝鲜那么有意思呢？”我当时是想写朝鲜亡国史，给中国人看：中国人要是不争气，也就跟朝鲜一样要亡国。到后来我写成朝鲜史时，朝鲜也独立了，就变成《韩国通史》出版了。

钟：我记得在30年代，黄炎培<sup>①</sup>先生写过一本《朝鲜》的书。

李：黄先生是写过一本，不过写法不同。那时我把朝鲜资料凑到一起，我那位老师拿去审查一遍，也看不出我的思想有什么问题，他本人也不研究韩国史，结果对我说：“那你就继续研究下去好了。”反正他保证我没有问题就行了，我也很少同中国留学生在一起，反倒是同日本学生在一起多。那时我还翻译一些日本小说，是用来学习日文，也发表过一些。回想起来，如果我在大陆，一定是上延安的，不会上南京，因为一是思想同共产党接近；二是那时南京去不了，延安比较近。

我曾看见萧军的太太写的文章，（她姓王），说萧军到处找我找不到。是的，我们两人始终没有见过面，只有通信。他是

---

<sup>①</sup> 黄炎培（1878—1965），上海人。清末举人，同盟会会员，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。

经常在哈尔滨一家报纸副刊上发文章，我则在长春把住《大同报》的副刊，每一个星期总有篇东西发表。我们彼此通讯，萧军有几次想来看我，但是总有尾巴跟着他，商量还是不见面。那时东北的作家作品，全叫日本人给整理了。后来萧军就到关内去了，到上海见鲁迅。他这个人有血性。萧红则有才。我前几年回长春，接待的朋友说：“你跟萧军、萧红有交情，无论如何也要去萧红纪念馆望望。”我就去了哈尔滨呼兰，到她的家乡去看看。那年是开东北沦陷区文学研讨会，国外的、台港的、大陆的一大堆学者来参加，我在那儿又出了一次风头。

我在年轻时候，没什么本事，也没有靠山，也没有钱，但只知道：胆大的饿不死。后来我在南京时有空闲，就把《韩国通史》稿整理出来。等我去台湾时，本来已经上了“太平”轮船，我又有事上岸，“太平”轮一出海就沉了，我幸免于难，仅保留了《韩国通史》稿。后来50年代在香港出版了，现在我正在修订。我全是靠书本写的，在留日时，虽然也经过韩国几次，但印象不深。

到日本也不容易，50年代我一开始到东京开书店，他们全笑话我。第一，我的书店没有厕所大；第二，资金来源不明。我去周围一些书店看他们营业情况，他们装着看不见，不同我见面。等我再去几次，他们就拿鸡毛掸子乱打尘土，赶我走。我气得要死，得整整他们。我就降价卖书，你卖10块钱一本，我就卖8块钱一本；你卖8块钱，我就卖7块钱。结果是卖出本钱来了。我是不怕的，他们可不行了，没有办法，到年终时，像琳琅阁、山本书店老板们就请我去开忘年会，跟我说，咱们商量商量书价吧。他们服了我了，我也就同他们合作，现在他们成了我的代理店。

钟：有资金运转当然重要，但最根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需

要。

李：是为了文化交流。台湾当时没有能力去日本开书店，后来日本人同蒋介石先生讲：“你们海关扣的日本书，都够开图书馆了。”我当场做了翻译，蒋先生脸色都青了，一查是真的，只好放宽处理了那些书。结果又要我来日本开书店，我答应去开书店，但有个条件：不能拿我当思想犯。后来我又自己开“东海书店”，又被台湾买断了。我就又开办“中文出版社”，搞出版，书源很多，日本的吉川幸次郎<sup>①</sup>先生他们支持我的出版活动，出版了许多古籍，我请日本教授们来参观，一天就卖100多万元。我自己能经营了，共产党的书我也卖，因为日本是讲究商品规律的。我的办法是先买房子，再开书店，现在有好几栋房子了。

钟：中日一代学者都会感谢您，重新出版了这么多中日古书。

李：我的事全写进了《书海经筹记》<sup>②</sup>里了。我做事全是一个人奋斗，我也不服输，在环境险恶时更是如此。我既不贪污，也不枉法，不跟官瓜葛。东京大学一位教授，写过一本书：《日本的中国书店》，书中介绍了我的工作和那个时代的特点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吉川幸次郎（1904—1980），日本汉学家。为狩野直喜的得意门生。1928年留学北京大学，拜钱玄同为师。归国后在京都大学任教，编《元曲辞典》。用四库分类编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》。遗著：《吉川幸次郎全集》22册。

<sup>②</sup> 《书海经筹记》，李迺扬著，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年8月一版。